

DOI:

UDC: 2414-4746

薛贺予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 外国语学院,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中国

脑文本重构 - 《美国式婚姻》中瑟莱丝蒂尔的成长

塔亚莉·琼斯的《美国式婚姻》以美国大规模监禁制度为背景, 通过非裔夫妇罗伊与瑟莱丝蒂尔的书信叙事, 揭示种族与性别双重暴力对个体选择的规训机制。本文基于脑文本理论, 聚焦于瑟莱丝蒂尔的书信内容, 分析书信如何作为“存储于大脑的感知与认知”的物质载体, 外化人物心理创伤, 展示其脑文本重构过程。瑟莱丝蒂尔的堕胎选择则暴露非裔女性在身体自主权与种族污名化的现实困境。其脑文本经历三重重构: 首先, 从现实出发, 重新审视种族与性别困境; 其次, 历经婚姻中的权利博弈, 完成堕胎的理性选择; 最后实现自我和解。琼斯通过书信将个体叙事升华为对白人主导制度的批判, 揭示脑文本理论在解码美国结构性暴中的阐释潜力, 为非裔文学研究提供创新研究视角。

关键词: 脑文本, 书信叙事, 成长过程, 大规模监禁

美国非裔文学始终以揭露种族创伤与社会不公为核心使命。塔亚莉·琼斯的《美国式婚姻》将这一传统置于当代语境, 通过一场误判引发的婚姻危机, 展现了大规模监禁制度对非裔家庭的精神戕害。小说突破传统叙事模式, 在非书信体中嵌入书信对话, 使人物脑文本得以显化——这一形式创新不仅强化了叙事的私密性与真实性, 更成为解码种族压迫机制的关键线索。本文将结合文学伦理学批评, 重点挖掘瑟莱丝蒂尔的脑文本重构过程, 也为书信叙事提供了脑文本概念这一全新的解读视角。

塔亚莉·琼斯（Tayari Jones）是美国当代非裔女性作家，以其对非裔美国人家家庭、种族压迫与性别议题的深刻书写而闻名。作为琼斯创作生涯的里程碑，《美国式婚姻》集中体现了她的核心关切，如种族议题、性别批判等话题，通过罗伊的误判，揭露美国司法系统对非裔男性的系统性污名化；对瑟莱丝蒂尔的角色塑造挑战了“坚强黑人女性”的刻板印象，展现其脆弱性与主体性。

美国非裔中产阶层罗伊和妻子瑟莱丝蒂尔正值新婚情浓，却突遭横祸，受到同一旅馆女性的错误指控，罗伊被判入狱五年，在此期间，夫妻二人只能通过单薄的信件维系婚姻关系。随着时间流逝，二人的婚姻逐渐走向终点，从通信的内容可窥见瑟莱丝蒂尔心理的变化，也为解读其脑文本提供依据。在《美国式婚姻》中，书信内容呈现出瑟莱丝蒂尔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情感变化过程，这是其脑文本的形成与演绎的结果。“脑文本”指“以人的大脑为介质保存的记忆。是人的大脑以记忆形式保存的对事物的感知和认识”（聂珍钊，2020: 270）。人类通过感知形成对事物的初步认知，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思维活动，最终生成思想；当这些思想被大脑长期储存时，即构成“脑文本”。在《美国式婚姻》中，瑟莱丝蒂尔大脑中储存的文本经过物质转换成为实质的信件，书信内容显化了瑟莱丝蒂尔脑文本重构的过程：由身处社会困境中的初步觉醒到经历婚姻内部权力博弈的痛苦与挣扎，再到最后的自我和解。

一、书信叙事：脑文本的显化与伦理驱动力

聂珍钊提出，脑文本是“存储于大脑中的感知与认知”（聂珍钊，2017: 29），书信则是其外化的物质载体。在《美国式婚姻》中，罗伊入狱后，书信成为夫妻唯一的交流媒介。首先，书信展现了夫妻双方的脑文本博弈：罗伊通过宗教话语“上帝永不言弃”与家庭责任施压，试图将妻子固化为婚姻的附属品。其脑文本中隐含的白人父权逻辑——女性身体需为家庭延续服务——

——在书信中被赤裸呈现。其次，书信为读者体会瑟莱丝蒂尔脑文本的重构提供依据。正如艾伦·帕姆尔所说：“阅读小说就是阅读心理，”（Palmer, 2010: 21）对书信的解读可以“从认知视角出发考察小说人物的意识再现和心理特征”。（尚必武 2018: 37）通信为读者打开了直接倾听人物内心声音的通道，并与人物共同经历心理挣扎，感知其客观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例如，瑟莱丝蒂尔在堕胎争议中反复使用“沃土”隐喻，将身体比作贫瘠的土地，暴露其因婚外情堕胎创伤形成的“生育-风险”脑文本。由于“文学创作是在大脑中对脑文本和脑概念进行组合及编辑，然后形成新的文学脑文本保存在大脑中。”（聂珍钊，王永，2019: 167）因此，书信写作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是脑文本的物质表现形式。

从入狱前到入狱后，罗伊的脑文本始终停滞不前，也因此引发了夫妻二人的争论。其脑文本是父权制与信仰异化，其深受白人基督教伦理影响，将婚姻视为男性权威的象征。他对婚戒的执念暴露其男性尊严焦虑，而书信中对妻子事业的贬低（“艺术家的时刻”），实为对妻子脱离控制的恐慌。其脑文本的实质是白人父权规训的内化——妻子需为婚姻牺牲个体价值。而瑟莱丝蒂尔的脑文本则展现了从妥协到反抗的过程。她的脑文本经历了三重裂变：首先，学生时代的堕胎创伤，令她产生了将生育和风险相关联的消极观念；其次，罗伊入狱的现实压力迫使她的理性脑文本主导伦理选择，在采访中逃避谈论已经入狱的丈夫；最后，她在与安德烈的平等关系中，责任与欲望达成和解，最终通过生育实现自我赋权。

二、现实困境下脑文本的初步觉醒

美国司法系统通过“大规模监禁”将种族压迫合法化。罗伊的误判并非偶然，而是白人社会对非裔男性“性威胁”想象的制度化结果。瑟莱丝蒂尔从“局外人”到“受害者”的认知转变，揭示了非裔群体被规训的脑文本如何内化种族歧视。同时，她意识到自己正处于种族歧视与性别归寻的双重困境之下，这

是她的初步觉醒。

“人的思想是应用脑概念进行思维的结果，思想的存在形式就是存储在大脑中的脑文本，按照某种伦理规则建构的能够表达明确意义的脑概念组合。”（聂珍钊，2017：33）换言之，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价值体系下，美国非裔脑概念受其规训，产出符合美国主流伦理取向的脑文本。因此，客观存在的社会动因是夫妻二人的脑文本生成的根源。在美国大规模监禁制度这一宏观社会背景下，同白人相比，非裔普遍面临着更为严苛的审判标准，这一社会困境是助推《美国式婚姻》情节的根本动力。罗伊入狱引发了瑟莱丝蒂尔思想的转变，她跨出原有的思维舒适区，打破了政府营造的温柔假象，试图挖掘黑白种族间潜藏的双重标准，搜寻美国非裔所遭受不公对待的痕迹，并重新审视自己身处的社会和面临的困境。

大规模监禁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 19 世纪末的吉姆·克劳法，该法强制公共设施依照种族的不同进行隔离使用，并在“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下，种族隔离被解释为不违反宪法保障的同等保护权。大规模监禁是当代美国奴隶制和吉姆·克劳法则的变体，是美国政府为非裔群体定制的镣铐，其往往隐藏在和平的表象之下，并为以瑟莱丝蒂尔和罗伊为代表的黑人家庭带去突如其来的灾难，对非裔个体的心理造成难以磨灭的创伤。这一制度变体不仅是白人主导的政治体制有意为之的结果，也佐证了美国非裔群体抗争进程的艰难。除了社会体制的禁锢以外，白人主流价值也同化了美国非裔的思维模式，削弱了其自主抗争的意识。

首先，非裔群体受白人主导的政治体制控制。纵观整个美国社会框架，无论非裔男性还是非裔女性，都处于弱势，被动地接受白人建构的伦理体系对他们的制约和判决，这种被动逐渐演化为无意识的恭顺，沉默的服从，最后成为黑人群体应对白人判决的公认处事原则。其次，非裔群体内部大多只注重自身而忽视群体，政治敏感性大幅削弱。作为新生力量，接受高等知识

教育的学生们本应透过现实敏锐察觉社会动向，却也对此类事情视若无睹。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社会宁静和谐的表现不知不觉中剥夺了非裔群体的平等权利，钝化了非裔对不平等待遇的感知力，残酷的监禁体制对非裔群体的折磨被掩盖在黑白“其乐融融”的氛围之下。最后，公众对历史教训有意的抹除或无意的遗忘，降低了非裔个体的警惕性，使其放慢了追求平等的脚步，从而导致黑人争取权利的进程迟滞不前。

瑟莱斯蒂尔在第二封信中提到，大学时期，一名被误判坐牢几十年的黑人男子来到斯佩尔曼学院，与最先指控怀疑他的白人女子共同发表了一场演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灵魂都得到了救赎。”（琼斯, 2020: 47）

“尽管他们就站在我面前，我还是感觉他们只像是历史中的一个教训，是密西西比州昔日的幽灵。他们的故事跟我们这群为了拿学分而挤在教堂里的大学生能有什么关系？而现在我真希望自己能记得他们所说的话。我知道总有些人会遭遇那种不幸，可不曾想我们竟也会成为“有些人”中的一员。”（琼斯, 2020: 47）瑟莱丝蒂尔的文字揭开了美国残酷的种族现实的冰山一角，其信件佐证了美国种族歧视顽固性和复杂性。对这封信件中瑟莱丝蒂尔的脑文本分析可分为三部分：黑人民权运动历史的回望，权利得到法律保障后的种族现状，以及个体立足现实冲击的担忧。

首先，瑟莱丝蒂尔回望了黑人民权运动的历史。“密西西比州昔日的幽灵”暗示着 1964 年的黑人民权运动“自由之夏”。密西西比州一向被视作种族主义者的顽固堡垒，尽管黑人占据了该州 40%的人口，但黑人选民登记率极低，截止到 1962 年，选民登记率仅为 7%，可见黑人的政治参与受到严格限制。该运动赢得了全国关注，为促成林登·约翰逊总统和国会通过了 1964 年的民权法案和 1965 年的投票权法案，在法律层面终结了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禁止了基于肤色种族等原因的就业歧视，保障了黑人的投票权。对平等民权的追求往往伴随着流血和牺牲，在十个星期的运动中，志愿者们遭受三

K 党以及各级执法人员的暴力对待。其中，三名志愿者（Michael Schwerner, Andrew Goodman 和 James Chaney）在调查黑人教堂被焚事件后失踪，为民权牺牲的英灵已成为历史书中短短的几行文字，“幽灵”影射为争取黑人权利付出生命的烈士，也讽刺了美国大规模监禁制度是阴魂不散的吉姆·克劳法的等价替代品。

而后，瑟莱丝蒂尔的信件中映射着非裔权利得到法律保障后，社会体制下种族的现状。时过境迁，无论是“自由之夏”民权运动，还是演讲男子被误判几十年的事件，非裔群体对前辈的牺牲和一次错误判决的关注早已烟消云散，但类似误判的阴影依旧笼罩着他们，如鬼魂般如影随形。当日的“幽灵”以相似的方式再次出现在瑟莱丝蒂尔的生活中，主角却换成了自己的丈夫，可见政府显然没有从频繁误判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否则罗伊不会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捕，这是整个美国社会对非裔任意歪曲和指责的缩影。“对黑人男性性与任意的歪曲与指控早已成为白人维系其父权地位的一种畸形的陈述方式。”（苏晖, 2020: 243）大学时期的瑟莱丝蒂尔只是为了拿学分而去听了这场讲座，并未考虑到此类不幸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她的叙述带有懊悔情绪，感叹自己原来的少不更事和对种族现状的漠不关心，当此类“历史教训”再次降临并应验在自己身上时，她才能对当事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我知道总有些人会遭遇那种不幸”，这显然是大学时期的瑟莱丝蒂尔对非裔群体面临的社会困境的初步认识，她深知同胞普遍遭遇的不幸，却无动于衷，当自己变成“有些人”中的一员时，也像他们一样无力改变现状。“而现在我真希望自己能记得他们所说的话”，瑟莱丝蒂尔对监禁体制的态度由事不关己变为追悔莫及，她的思想发生了十分明显的转变。“所有的文本都是在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脑文本也是由脑概念构成的。脑概念是思维的工具。人的思维过程是脑概念的组合过程。”（聂珍钊, 2017: 31-33）在瑟莱丝蒂尔的脑概念中，她试图整合美国社会对黑人制造的群体困境，及群体困境投射到个体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关系脉络，并按照美国非裔生存的伦理规则将这一关系

构建为脑概念组合，形成思想存储到大脑中，形成脑文本。家庭巨变对瑟莱丝蒂尔脑概念的重构，驱使着其反思美国非裔生存现状，瑟莱丝蒂尔脑概念当中的种族意识觉醒导致了其思维方式的转变，由此生成脑文本。这一困境暴露了白人父权制如何通过伦理规训分裂非裔群体的主体性。

此外，在非裔种族不公待遇的基础上，非裔女性又多了一层制约，即性别枷锁对身体自主权的限制。美国反堕胎主义者组织的声势浩大的反“堕胎合理化”抗议活动，阻止女性拥有支配自己身体自由的权利。同时，女性堕胎的选择无法得到旁人的理解的普遍现状，也塑造着瑟莱丝蒂尔对身体自由概念的脑文本。“只要你是个成年女人，只要你的银行账户余额多于十美元，人们就理解不了你为什么要打掉孩子。...诊所附近聚了一群反堕胎的人，他们喊着口号，举着让人恶心的标语。”（琼斯，2020：51-52）留下孩子意味着重复“囚犯父亲-单亲母亲”的悲剧循环，陷入制度化贫困。选择流产则是对个体尊严的捍卫，却需承受“背叛种族”的道德谴责。与对群体困境的困惑不同，瑟莱丝蒂尔关于女性身体自由的脑概念十分清晰。瑟莱丝蒂尔面对群体困境不以为意的心态和面对女性个体困境所表现的敏锐判断，折射了现代美国非裔脑文本中关于群体和个体地位脑概念的错位。“黑人之间纯洁的种族情感纽带在城市变得异常淡薄和脆弱，黑人受城市商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成为黑人之间的交易和交往准则。”（谢梅，2018：19）个人主义消解了民族认同感，即关于个体利益的脑概念占据主导地位，凌驾于关于群体利益的脑概念之上。值得深思的是，群体发展与个体权利唇齿相依，在无法确保种族人民权利公平的情况下，个体的权利似乎只有唇亡齿寒的结局。

三、脑文本中的权力博弈

对话式的书信交流令“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在这里实现了自由转化”（王杰春，2013：66）。在瑟莱丝蒂尔关于堕胎的脑文本中，瑟莱丝蒂在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两个身份间不断，在书信中和丈夫进行婚姻内部的权利博弈。

瑟莱丝蒂尔不合时宜地怀上了他们期盼已久的孩子，这却成为二人争吵的导火索，两人围绕孩子的去留展开激烈的争论。当面临必要的抉择时，“脑文本决定人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行为，决定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本质。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由脑文本决定的，一个人的伦理和道德也是由脑文本决定的。”（聂珍钊，2017：33-34）因此，瑟莱丝蒂尔书信中与丈夫对孩子去留的争论以及她最终选择堕胎都是脑文本发生作用的结果。

瑟莱丝蒂尔的怀孕在无形之中给罗伊带去了希望，他在信中表达了留下孩子的强烈意愿，尽管他不希望孩子有一个坐牢的父亲，但他仍对孩子的到来感到由衷的喜悦并他设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并且他将小时候一个叫“鸟崽”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相比，并将照料孩子的责任寄希望于双方背后的家庭助力，认为“在重获自由之前照料他既是他们的特权，也算一种义务”。

（琼斯，2020：49）由于罗伊人身受限，他便将为父的义务转移到他人身上。他希望瑟莱丝蒂尔留下这个孩子，这一要求隐含着他对审判结果的忐忑，也预示着他二人婚姻未知性的恐慌。对罗伊而言，孩子的降生是瑟莱丝蒂尔对他审判结果的信心的有力证明，也将成为延续二人婚姻的强力支柱。“当我们放弃的时候，上帝也放弃了我们。我知道上帝永不言弃，但你懂我想表达的意思。”现代美国非裔信奉的基督教起源于“奴隶制下白人出于身心双重控制奴隶为目的而引导黑人接受的基督教信仰。”（谢梅，2018：16）因此，在大规模监禁体制的政治束缚下，白人创立的宗教信仰是非裔群体的第二重枷锁。这也演化成对美国现代非裔身心双重控制的变体。与此同时，在身心受到双重禁锢的情况下，丈夫仍试图利用白人创造的基督教义对瑟莱丝蒂尔进行道德层面的谴责，令其屈服于白人对非裔种族的规训。另外，莱丝蒂尔

依旧无法摆脱被丈夫物化为财产的陈旧思想，作为妻子却像物品一样不能拥有想法。“你爸妈也在我的探视名单上”，罗伊通过高语境话语（High Context）含蓄透露岳父岳母与自己的联系，暗含了威胁警告的意味：他企图通过父母对孙子的盼望来向瑟莱丝蒂尔施压，对妻子造成心理压力和牵绊，以此说服自己留下孩子。他搬出上帝，长辈，利用宗教和家庭逼就范，暗示瑟莱丝蒂尔应有所取舍，将她流产与对自己审判结果的信心相联系，这种牵强附会的等价关系为瑟莱丝蒂尔的抉择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你是问我还有谁知道我打掉孩子呢，还是问我还有谁知道是你让我打掉孩子的？只要你是个成年女人，只要你的银行账户余额多于十美元，人们就理解不了你为什么要打掉孩子。可是我的丈夫在监狱里啊，我要怎样做母亲？”（琼斯，2020：51）瑟莱丝蒂尔并不想将怀孕堕胎的事情大肆宣扬。在她的脑文本中，女性不得已的堕胎往往得不到旁人的理解与支持，她一边控诉着这一现象，一边向丈夫强调二人所处的困境，希望从丈夫处得到理解与支持。她渴望丈夫设身处地为她考虑，向丈夫索求情感上的支撑。

即便瑟莱丝蒂尔经历了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损伤，罗伊仍只顾自己的情绪输出，重提婚礼誓词环节妻子对“顺从”二字的抵触来嘲弄妻子“自主意识”过强，他在潜意识中早对妻子“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之类的观念嗤之以鼻，脑文本建构过程中，罗伊将妻子的言行视作自私，忽视了妻子承担的痛苦。他尖锐地指出“不要表现得像个听话的小女人”。罗伊的脑概念将瑟莱丝蒂尔自主堕胎一事归因于其受到的教育，在罗伊眼中，诸如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之类的“大道理”都是鼓动妻子脱离自己掌控的“元凶”。结婚初期，罗伊便对妻子“过强”的自主意识颇有微词。瑟莱丝蒂尔大学时期有关女性身体自由，思想自由的教育，塑造了她独立自主的意识形态，也因此塑造了她女性个体自由的脑文本。这令罗伊总是无法干预她的决定。因此在他的脑文本中，妻子堕胎只是表面的顺从，实则是自我意识过剩的结果。如“你的身体由你做主，

你在斯佩尔曼学院学了很多诸如此类的大道理。”（琼斯，2020：53）罗伊脑文本中将妻子的启蒙理念归类为“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的“大道理”，侧面印证了罗伊无法真正理解瑟莱丝蒂尔的内心，也是罗伊对妻子不受自己控制，自己男性尊严受到摧残的挖苦。尽管夫妻二人的脑文本不间断地交流，但二人并未完全触及彼此的灵魂，罗伊的脑概念只徘徊于“堕胎”事件的表层原因，而未深入了解妻子的脑概念，即妻子的意识结构。冷漠忽视妻子亟需的情感理解，粗暴地指责妻子的自私，这对瑟莱丝蒂尔造成了除丈夫入狱，堕胎的心理和身体伤害外的第四重伤害。一般情况下，“信件的读者或观众对治愈受害者的创伤发挥了重要作用。”（Coulibaly，2017：112-113），罗伊和瑟莱丝蒂尔都是受害者，也是彼此的叙述受者，但二人对流产的争执加重了双方的内心创伤，也堵塞了脑文本的交流通道。相反，安德烈并未否定打压瑟莱丝蒂尔的决定，他只是说“你不能一个人去”，给予瑟莱丝蒂尔希望的支持和保护。这是读者理解瑟莱丝蒂尔最终伦理选择背后动机的潜在暗示。

随着年岁的逝去，瑟莱丝蒂尔在外界大展拳脚，事业蒸蒸日上，而罗伊仍身陷囹圄，只能透过栏杆间的空隙接触到外界微薄的空气。二人的差距逐渐扩大，瑟莱丝蒂尔经常忙于工作而忘记给罗伊回信，接受访谈时也向媒体刻意隐瞒了丈夫入狱的消息。对此，瑟莱丝蒂尔给出的回应是，“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在回答环节对着麦克风将这么痛苦的事情。或许有些自私，可我向享受自己作为艺术家的时刻，而非囚犯的妻子。”（琼斯，2020：67）对于罗伊质疑自己与安德烈的感情这一话题，瑟莱丝蒂尔写道“你关于安德烈的那些蠢话，我甚至都不屑于回复。你现在肯定已经恢复了理智，所以，我提前接受你的道歉”（琼斯，2020:67），看似不屑于回答丈夫对自己忠贞情感的怀疑，但在此之后，瑟莱丝蒂尔再未在信中提到过安德烈。在瑟莱丝蒂尔给罗伊的18封信中，有7封主动提及二人的好友安德烈。无论是作为读信人的罗伊还是读者，通过阅读瑟莱丝蒂尔的书信，“无数次地走出自我、进入别人的思想和情感之中。”（伊恩，1992：225）透过她的信件，可以推断安德

烈在她日常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探视罗伊，流产手术，建立手工娃娃的品牌，等等重要场景都有安德烈的身影。瑟莱丝蒂尔写信时下意识流露出对安德烈的依赖，书信中对他的存在理所当然的态度和习以为常的口吻都成为罗伊和读者窥探她情感的探测器。正如亨利·菲尔丁所言，“一个人，不管有多么诚实，他的行为，一经他自己亲口讲述，都要变得与己有利，这是由不得他自己的；因此他的罪恶，通过自己的唇舌，都要变得澄清明净，就像浊酒仔细滤过，把所有的浊物都留下一样。”（申丹，2005：29）

书信为二人建构与外界隔绝的框架区隔，是夫妻袒露秘密、实现两人脑文本互通交流的“隔间”。“书信体小说的出现和流行促使社会建造更多的私密化的私室”（张德明，2002：38），即以大面积公共空间为传统的房屋结构逐步被独立小空间居室的建筑模式所取代。而在《美国式婚姻》中，塔亚莉创造性地将物理层面的建筑模式置换为精神层面的私密化空间，罗伊和瑟莱丝蒂尔在彼此的脑概念中营造了一个“私室”，以此通过脑概念有机组成的脑文本倾诉秘密。为了寻求罗伊对她堕胎的理解，瑟莱丝蒂尔曾向他坦白了结婚前与霍华德大学一位教授的婚外情和堕胎的经历，她的信件在罗伊的脑概念中建立了脑文本交流的封闭空间，通过密闭的信息通道传输自己埋藏已久的秘密。流产和失恋的打击是一场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损伤，也为瑟莱丝蒂尔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即便对瑟莱丝蒂尔来说是旧事重提，但对罗伊和读者来说，信件中发生的陌生“事件是绝对主观的和现时即刻性的时间”（张德明，2002：40），旧日的伤疤经过书信在时间上得到延展，是理解瑟莱丝蒂尔堕胎动机的有力因素。在此之后，罗伊和读者无法接收到关于安德烈的脑文本，而“人的心理活动也是以脑文本为载体的，没有脑文本，心理活动就不可能存在。”（聂珍钊，2017：33）在罗伊提出质疑前，他能够通过瑟莱丝蒂尔的脑文本探究她的心理，在安德烈“失踪”后，罗伊通向瑟莱丝蒂尔内心情感的通道被瑟莱丝蒂尔单方面关闭，罗伊再接触不到瑟莱丝蒂尔内心的“秘密”，直到瑟莱丝蒂尔的信中写道“我不能继续做你的妻子了。”（琼斯，

2020: 83) 这封信看似突兀, 实际上之前每次的信件都在为最终的结局作铺垫。

四、脑文本中的自我和解

除了对社会困境的清楚认知, 以及对婚姻权力博弈的最终胜出, 瑟莱丝蒂尔的脑文本中也展现了由恐惧生育到与自我和解的过程。

纵观整部小说, 瑟莱丝蒂尔共经历了三次怀孕, 只有第三个孩子被留下, 她的选择与脑文本的重构密不可分。脑文本的建构经历了复杂周密的处理。现实生活中积累的伦理经验和客观事件引发的思想变化重组了瑟莱丝蒂尔关于生育的脑概念, 新的脑概念构成新的脑文本, 并驱使瑟莱丝蒂尔作出不同的选择。

第一次, 学生时代的婚外情, 欲望驱使瑟莱丝蒂尔做出违背伦理道德的选择, 享受快感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风险与惩罚。经此一事, 她自觉将怀孕有关的脑概念与痛苦和风险画上等号。第二次怀孕发生在罗伊入狱后, 曾经的创伤经验以及丈夫亟待解救且长时间缺位的严峻现实, 使瑟莱丝蒂尔的理性占据了脑概念的主导地位, 脑文本中关于爱与激情的想象被残酷的现实撞得粉碎。考虑到自身的精力有限, 无法兼顾为丈夫上诉与照顾新生儿的重担, 因此瑟莱丝蒂尔选择流产, 避免孩子的降生及后续的压力。这次堕胎后, 瑟莱丝蒂尔用“沃土”将身体比作孕育新生的土地, 暗示自己身强体健, 具备优越的生育能力。但她的精神却早已枯萎, 人生的挫折为她带去了太多痛苦, 她的“人生不是游戏, 不是演习, 也不是电影,”(琼斯, 2020: 51) 不像土地耕耘过后有重新收获的机会。在瑟莱丝蒂尔的潜意识中, 她认为自己的人生已经衰败了。第三次怀孕, 在她和罗伊离婚并与安德烈在一起后, 她没有选择结婚, 但却选择生下这个孩子, 此时, 脑文本凸显了瑟莱丝蒂尔感性与理性的和谐互融。

四、总结

本文通过解读瑟莱丝蒂尔的书信内容，以脑文本理论为框架，探寻了非裔女性在种族与性别双重压迫下的成长轨迹。瑟莱丝蒂尔的脑文本经历了从现实困境的觉醒、婚姻权力博弈的理性抉择到最终自我和解的三重重构过程，其堕胎选择不仅是对身体自主权的捍卫，更是对白人父权制与种族污名化的无声反抗。琼斯借助书信这一私密化载体，将个体心理创伤外化为公共议题，批判了美国大规模监禁制度与结构性暴力的系统性压迫。瑟莱丝蒂尔从被动受困到主动突围的转变，既映射了非裔女性主体性的觉醒，也为解码种族与性别交叉压迫的复杂性提供了文学范本。这一研究不仅拓展了脑文本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阐释潜力，更凸显了非裔文学在揭露社会不公与推动伦理反思中的独特价值。

参考文献

1. Palmer, A. (2010). *Social Minds in the Novel*.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P.
2. Ngom, O. (2018). Conjuring Trauma with (Self)Derision: The African and African-American Epistolary Fiction. *European Scientific Journal, ESJ* 14.2, 1-1.
3. Coulibaly, B. (2017).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dans la nouvelle oust-africaine d'expression anglaise*, Paris: Harmattan.
4. 塔亚莉·琼斯著. (2020). 美国式婚姻（美）；刘策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
5. 尚必武. (2018). 非自然叙事的伦理阐释 — 《果壳》的胎儿叙述者及其脑文本演绎. *外国文学研究*, 40(03), 30-42.
6. 聂珍钊. (2017). 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外国文学研究*, 39(05), 26-34.
7. 聂珍钊 & 王永. (2019).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脑文本：聂珍钊与王永的学术对话. *外国文学*, (04), 166-175.
8. 聂珍钊 & 王松林. (2020).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9. 王杰春. (2013). 书信体小说的叙述性辨析 — 以两部西方经典作品为蓝本.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9(04), 65-69.
10. 伊恩·P·瓦特. (1992). *小说的兴起*. 三联书店.
11. 易丽君. (2018). 论书信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 *江西社会科学*, 38(04), 111-117.
12. 张德明. (2002). 近代西方书信体小说与主体性话语的建构.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03), 37-43.
13. 申丹, 韩加明, & 王丽亚. (2005). *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 徐彬. (2020). *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
15. 谢梅. (2018). 《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中“宗教信仰”和“黑人社群”的双重性书写.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35(10), 16-20.

RECONSTRUCTION OF BRAIN TEXT: THE INITIATION OF CELESTIAL IN AN AMERICAN MARRIAG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American mass incarceration system, Tayari Jones' *An American Marriage* reveals, through the epistolary narratives of the African-American couple Roy and Celestial, the mechanism by which the double violence of race and gender disciplines individual choices. Based on brain text theo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tent of Celestial's letters and analyzes how the letters serve as a material carrier of "perceptions and cognitions stored in the brain", externalizing the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demonstrating the process of brain text reconstruction. Celeste's choice of abortion exposes the dilemma of African-American women in terms of bodily autonomy and racial stigmatization. Her brain text undergoes a threefold reconstruction: first, she re-examines the dilemma of race and gen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ty; second, she completes the rational choice of abortion through the game of rights in marriage; and finally, she realizes self-reconciliation. Jones sublimates the individual narrative into a critique of the white dominant system through the epigraph, revealing the interpretive potential of brain text theory in decoding the structural viol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viding an innovative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ture.*

Keywords: brain text, epistolary narrative, Initiation process, mass incarceration.